

从“新经济”走向“新经济”：德国社会生产体系的连续性与变革

——评阿贝尔斯豪塞的《1945年至今的德国经济史》

史世伟

内容提要：德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维尔纳·阿贝尔斯豪塞在《1945年至今的德国经济史》这部力作中将史实与经济理论相结合，阐释了二战后德国经久不衰的国际竞争力来源于威廉帝国时期形成的社会生产体系。这一论断挑战了将二战后德国经济的成就归功于与传统决裂、全面引入自由市场经济的观点。德国战后“经济奇迹”的首要原因不是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货币改革或社会市场经济的引入，而是当时特殊的、不可重复的历史条件。阿贝尔斯豪塞有关制度变革历史和文化特殊性的阐释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制度改革和经济政策的调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德国 经济史 社会生产体系 社团市场经济 新经济

2011年，德国政府与工业界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首次提出了“工业4.0”的概念，即将通过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的研发和使用实现制造业的数字化与智能化，并宣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这一倡议立时引起了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与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在过去的十年中，与其他工业国家相比，德国制造业的增加值一直稳定在较高的水平。这主要归功于德国有适合制造业发展和保持其国际竞争力的生产体系与教育体系。正因为德国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居于领先地位，其工业4.0计划才受到这样的重视。根据“长波”理论，每隔一段时间出现的新技术集群是社会演化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①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和大规模消费品生产的衰落促进了信息、半导体、微电子技术的加速发展，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应用使经济增长重新获得了动力。但

^① [英]克里斯·弗里曼、[英]弗朗西斯科·卢桑：《光阴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沈宏亮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148页。

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为我们敲响了警钟,2007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以虚拟经济为基础的“服务型经济”无法带来足够的就业与增长,制造业“空洞化”使许多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作为德国高科技战略的一部分,“工业4.0”是德国发挥自身技术与制度优势、应对国际国内挑战的重大举措。继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德国似乎又一次引领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这正是维尔纳·阿贝尔斯豪塞(Werner Abelshäuser)《1945年至今的德国经济史》(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Von 1945 bis zur Gegenwart)的核心主题。

一 关于此著作的总体思路

阿贝尔斯豪塞是著名的德国经济史学家,他早年在曼海姆大学学习国民经济学,后来转向经济史,曾任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经济与社会史讲席教授,目前是比勒菲尔德大学历史社会科学研究教授。他和其他学者一起成立了比勒菲尔德全球社会研究所。阿贝尔斯豪塞教授的研究范围较广,包括战后“德国经济奇迹”原因、德国企业史、19世纪后期以来德国生产体系与方式以及欧洲一体化等。而《1945年至今的德国经济史》这部鸿篇巨著洋洋洒洒,集其研究成果之大成。自1983年出版后,该著作在德国的影响逐渐扩大。1996年,德国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报纸《时代周刊》称其为德国经济史的“楷模之一”。^①其间,书每次再版,作者都对它进行了扩展和修改。本文评述的是2011年的修订版,它比2004年的版本多了100多页。

总体来看,《1945年至今的德国经济史》不是一部关于战后经济“重大事件”的编年史,而是一部研究德国经济模式及其影响的著作。^②作者试图在德国经济发展的长时段视野内审视德国经济与秩序政策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经济结构的连续性。他深知,要完成这一挑战需要采用不同于历史分析的其他方法,档案数据恐怕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起不了多大作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例如经济增长理论、景气循环理论、分配理论、对外贸易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的运用比对“重大决定”进行分析更重要,但是,其解释价值自然也必须经得起历史-经验主义的考验。在书中,阿贝尔斯豪塞继承了德国经济学以欧肯为首的秩序自由主义传统,在方法论上对困惑了德国经济学半个世纪之久的理论思考方法与历史思考方法的“二律背反”给出了自己

^① http://de.wikipedia.org/wiki/Werner_Abelshäuser,2015年5月20日访问。

^② 在此文中引用的作者阿贝尔斯豪塞的原话或大意,在后面就不一一注明了。

的答案。^①

当然,阿贝尔斯豪塞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最为关注的是历史的连续性。因此,他接受了同样是经济史学家的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D. North)的观点,即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他认为德国的“社会生产体系”(das soziale System der Produktion)或称“社团市场经济”体制(die korporative Marktwirtschaft)在威廉帝国时代奠基,德国经济的创新核心是19世纪晚期在机械制造、电子技术工业或化工业领域形成的多样化优质生产,它的实质在于利用经济与科学的新型共生关系实现无形价值的创造,这种价值创造只是在边缘上来自与传统工业一致的物质转化。它更多地依赖于对市场需求、研发问题的解决方案、生产程序、应用程序和可加工性的整合认知以及有利于产品适时供给、融资和确保其他质性特点的整合型服务。这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德国已经成熟的“新经济”(neue Wirtschaft),具备了20世纪70年代以信息革命为标志的“新经济”(new economy)的一些典型特征。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经济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全球化。而19世纪最后30年在德国崛起的新工业充分体现出全球化的能量和活力,世界市场导向策略和大规模的出口贸易正是其独特标志,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的世界经济动荡中断了这一进程。因此,阿贝尔斯豪塞对德国经济模式或生产体系能够适应当前“新经济”的挑战具有十分乐观的态度。在他看来,工业革命的颠覆性特征不应被绝对化,工业革命是人类知识和人力资本长期积累的结果。在德国,与之相应的制度体系也在工业革命出现时得以建立,此后不断完善。当然,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并不是否认变革。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历史与现实及其未来通过制度联系起来,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意味着社会与经济制度沿着一条历史上自发或情境依存选定的轨道演进,它不仅成为选择的限制,也为未来的发展指出方向。^②由此,不难解释为什么作者在一共十章的《1945年至今的德国经济史》中用整整一章来回顾1870-1945年的德国经济史。

该著作其余九章对于德国战后经济不同时期的篇幅分配也别具匠心。第二、三、四章是1945年至1969年的德国经济史,重点分析1947-1958年的德国经济。第五章是德国经济的国际维度,重点探讨欧洲一体化对德国经济的影响。第六、七、八章是1970-1979年的德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第九章回顾了1990年统一前民主德国的经济发展历程。而20世纪80年代至今长达30年的经济史仅仅用了第十章一章的篇幅。

^① [德]瓦尔特·欧肯:《经济政策的原则》,李道斌、冯兴元、史世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6页。

^② Douglass D.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vii.

诚然,一部历史著作的写作受到历史档案材料的限制,大多数国家或联盟机构的库存档案对于30年之内的资料是不公开的。因此,现今研究德国历史所能使用的数据仅限于到1970年代末。但在笔者看来,这并不是作者篇幅取舍的全部原因。1947-1958年与1970年代正是德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德国战后秩序政策形成与转变的两个关键时期,自然成为将对其阐述作为本书主要目标的作者的论述重点。而德国战后“经济奇迹”的根源和欧洲一体化的经济效应正是作者最富成果的研究领域。

下文尝试就上述三方面对著作的主要创新点进行较为详细的评介。

二 对于1950年代德国“经济奇迹”原因的解释

在德国经济史学界,阿贝尔斯豪塞最突出的贡献之一是其对德国战后“经济奇迹”根源的独特解释。以往包括德国史学界一些权威人士的习惯看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使德国沦为一片焦土,同时也彻底地摧毁了德国经济与政治的统治基础,战后的德国处于“零起点”。然而,阿贝尔斯豪塞却指出:“从总体上看,不论是东德和西德,还是两德重新统一后的德国都保留了经济发展的连续性。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联邦德国的经济史注定不会从零点开始”。“德国经济于1945年崩溃且涣散了,但德国根本不是一个‘欠发达’国家”。^①

阿贝尔斯豪塞之所以能够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一方面是他坚持在一个长期的框架内对德国1945年后经济史进行诠释,另一方面也在于他对1945-1948年即所谓重建前史料的深入挖掘,其对于德国著名企业历史的研究也有助于他了解德国当时的资源状况。他用数据证明,1945年德国的工业能力并没有被摧毁,生产设备也没有老化与落后,以往的研究夸大了战争轰炸以及战后盟军对于德国工业设备拆卸的影响。实际上,1945年工业设备投资的数目相当可观,而投资的质量也不错。二战末期,德国的质量等级——即净生产资产与毛生产资产之比——达到一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德国的战后重建既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始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在1949年建立),也不像许多历史学家断言的开始于货币改革的1948年,而是始于1947年。

那么,重建从哪一年开始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吗?笔者认为,这对德国战后所谓的“经济奇迹”的解释具有重要意义。所谓德国战后“经济奇迹”指的是1948年德意志

^① Werner Abelshäuser, *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von 1945 bis zur Gegenwart*. 2. Auflage,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11, p. 24, 15.

联邦德国成立后经过一段困难时期,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如在 1950-1965 年,德国人均产值平均增长了 5.6%,其中 20 世纪 50 年代的国内产值的年均增长更是高达 8% 左右,大大高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同期的平均水平。德国史学界对于二战后德国经济史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强调“马歇尔计划”(1948 年)、货币改革(1948 年)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于战后西德经济重建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它们成为许多历史学家和政论家解释“经济奇迹”产生的最主要原因。阿贝尔斯豪塞当然不否认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德国经济超常规增长以及联邦德国重新崛起的作用,但对它们的决定性作用有所保留,特别是他用详尽的史实和数据证明,马歇尔计划对于德国经济重建的作用是有限的。他认为,战后德国经济腾飞的根源必须在一个包括整个 20 世纪长期历史的框架中去寻找。一战爆发至 20 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工业失去了先前的工业腾飞的主导趋势,战争、动乱、通货膨胀与紧缩危机决定着这一时期经济史的基调。此外,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如国家社会主义的上台,许多历史学家倾向于将这一阶段当做“非规律”的特殊时期将它剔除于分析行列。但是阿贝尔斯豪塞认为,正是这段时间德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二战后经济重建的特殊条件,而这些条件在 20 世纪 50 年代传统意义上的重建期结束后则不复存在。1933 年纳粹政权上台后,推行了“德国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制造了“德国经济奇迹”(1933-1938 年)。当然,它部分也要归功于魏玛共和国期间经济黄金阶段的储备与积累(1919-1923 年)。二战爆发后,德国转向了战争经济。战争经济在带动 40 年代上半期军备扩张的同时,也为 1945 年以后德国经济的迅速重建创造了前提条件。在军事需求和战败恐惧的重重压力之下,德国工业成功实现了创新。德国工业不仅实现了理论上的技术进步,而且学会了如何将理论应用于现实。正是纳粹政权在 1937 年使工业职业培训和资质认证成为第三帝国时期的一场全民运动。因此,被战争和经济动荡“压制的”德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以及由于战争后果造成的大量年轻和经过良好职业培训的德国难民涌入西德成为“经济奇迹”的前提。从经济理论的角度上看,阿贝尔斯豪塞采用“重建期”假说来解释战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即经济增长有一种经济发展进程遭遇中断后又重返增长轨道的趋势,因为该进程反映了经济上可能的和历史上实现了的增长。由此,他对流行的其他两种解释模式:结构断层假说和赶超假说提出了质疑。

1975 年,阿贝尔斯豪塞在他的博士论文“1945-1948 年的西德经济:美英占区重建与增长条件”中提出了上述观点,当时遭到德国历史学界的强烈反对。德国现代史权威巴林(Arnulf Baring)曾称其为“异端邪说”。^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观点逐

^① http://de.wikipedia.org/wiki/Werner_Abelshauser, 2015 年 5 月 20 日访问。

渐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说,阿贝尔斯豪塞改写了联邦德国的经济史。阿贝尔斯豪塞关于德国重建与经济奇迹特殊条件的观点成为人们理解德国战后经济史的一把钥匙。接受了他的这一观点,对于1990年两德统一时,通过货币改革以及一次性地在原东德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再次创造奇迹就不会感到意外了。

三 德国社会生产体系的比较优势及其改革

阿贝尔斯豪塞认为,德国经济从威廉帝国开始就逐渐从物质生产向非物质生产过渡,德国工业有别于其他工业文明的突出特点为充分满足客户需要的定制化。他将这种专业化模式称为“多样化的优质生产”。而这种专业化模式作为德国的社会生产体系延续至今。即便是二战后接受了美国的大众消费品流水线作业生产方式,德国工业也没有完全放弃这种模式,而是将这两种模式的优势结合起来。而与这种生产模式相适应的“社会生产体系”,即德国特殊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安排被他称为“社团市场经济”。它的最主要的特征在威廉帝国时期即已形成。社团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促进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的合作而非竞争。在经济组织上,它主要表现为通过大型股份公司管理层的双层结构帮助其有效对接社交网络,并将来自各类重要经济领域的信息流入组织内部,从而优化企业决策基础。企业监事会选入银行业的代表不仅能够实现对企业更好的监督,还能为企业提供长期的金融支持。股份有限公司虽是证券交易所风险资金的募集主体,但银行(全能银行)掌管证券发行业务,同时,它们为大多数股东行使保管人投票权并确保金融关系的长期稳定。德国投资者(包括小股东)的投资行为不是股东价值原则导向的,而是将自己看作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其投资动机不在于获得短期收益,而是希望通过企业的财富增值实现长期盈利的目标。因此,这种生产体系有利于着眼长期性和持久性的公司。该生产体系的其他组成部分——例如行业体系、劳动关系和教育体系——的运作方式都遵循着相同的目标导向,通过各联合会内部的合作、与统一的工会组织建立伙伴关系以及在共同的企业外部培训中形成技术类行业标准。德国还建立了学校与企业的双元职业培训体制,为生产的稳定和高质量的高标准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经济政策领域,德国奉行“生产性秩序政策”,目标是设定并实施大多数经济主体都遵循的规则和标准。它与英美式的、德国在1879年以前奉行的自由主义政策大相径庭。它所涵盖的领域除了对外经济还包括广义的基础设施政策、区域发展政策(既包括经济发展政策也包括社会发展政策)和旨在挖掘和激活人力资源潜力的职业

导向型教育政策与培训政策。德国的国家经济政策自产生以来就依赖于众多主体。早在帝国时期,中央政府就不得不将精力集中于对外贸易政策领域,并将国内市场经济的管辖权交由各联邦州。地方政府的经济活动同样十分重要。自20世纪初以来,市、镇、县就掌控着经济领域内最活跃市场上一些行业的经济活动,例如电力行业和其他能源供应企业或地区金融业(储蓄所)。另外政府还推行了促进知识进步与科研发展的政策,以适应生产科学化的需要。在德国,制定秩序政策的主体是国家,而对经济运行的管制职权则属于整个社团市场经济体系。它的运作基于拥有自主行动权的社会团体、协会、公司和康采恩之间的自由合作。国家对此种关系的建立和架构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并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和支持。对经济发展的进程和结果起决定作用的责任主体还是经济界本身。随着工会组织自20世纪初不断壮大,其在德国生产体系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经济联合体与工会之间的社团利益博弈成为德国社会国家产生的源泉。

但是众所周知,二战以后德国建立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其思想来源之一为秩序自由主义,它将建立竞争秩序作为经济政策的核心。这与阿贝尔斯豪塞描述的强调合作的“社团市场经济”体制岂不是对立的吗?确实如此。在经过魏玛共和国的国家调控失败以及纳粹德国时期的“国家统制经济”后,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它的内容随着时间进程不断发生变化——起初被当做是与俾斯麦时期建立的社团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制度模式,一个有意识的、在战后制度“真空”时期成为可能的政治决策的产物。然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改革自由主义各派别,无论是以欧肯为首的秩序自由主义弗莱堡学派还是米勒-阿尔马克与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派都肯定国家有限干预的积极作用,但他们的观点与当时流行的凯恩斯主义不同,认为国家干预的目标主要在于建立和维护竞争秩序以及履行社会责任,而不是过程政策的宏观调控。因此,阿贝尔斯豪塞指出,将社会市场经济作为1945年后对国家经济控制回应的观点是有待商榷的。更确切地说,它是社会学习过程的产物。这个过程始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末期并在第三帝国时期取得了一系列初步进展,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连贯性和延续性不容忽视。上述历史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界和管理界精英对此类思维模式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对1947年以后社会市场经济的实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在联邦德国建立初期的政策实践中,以艾哈德为首的经济决策层在1948年货币改革后确实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坚决捍卫自由经济市场秩序和供给导向的经济政策,为联邦德国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是到了1951年,当德国经济在朝鲜战争影响下出现危机时,德国又重拾经济联合会调控经济的机制,实现了社团市场经济的

回归。

当然,阿贝尔斯豪塞并没有断言战后的“社团市场经济”与威廉帝国、魏玛共和国、甚至在纳粹德国时期被扭曲了的社团市场经济完全相同。若果真如此,那么德国就没有从经济危机、政治动荡和战争中吸取教训。这首先体现在《卡特尔法》的制定上。卡特尔是独立企业在自愿基础上以合同形式组成的联盟,因此曾经是德国合作式市场经济的一种普遍形式,德国曾被认为是“卡特尔的典型国家”,但卡特尔也是欧肯深恶痛绝的私人权力垄断市场的工具。因此,1957年通过的《反对限制竞争法》(简称《卡特尔法》)就成为市场经济的“宪法”。虽然战前卡特尔联盟的官僚化使当时许多工业企业家们也感到厌倦,但是《卡特尔法》的制定还是遭到了经济联合会与执政党内部一些人士的抵制和反对。最终,艾哈德力排众议,在历史的“重大关头”(critical junctures)^①完成了在德国取消卡特尔的立法壮举。

在对社会市场经济中“社会”(sozial)定语的理解上,改革自由主义者也基本上贯彻了自己的意愿。虽然《基本法》继承了《魏玛宪法》的传统,将“社会国家”与“民主和联邦制国家”一道作为国家秩序的基础,但是除所有权的社会责任外,对它的目标及实现方式并没有做出具体规定,从而使其成为一个开放的概念,这一点与魏玛时期显然不同。在魏玛共和国时代,“社会国家”是经济与社会秩序的核心内容,“社会国家”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含义,这成为导致魏玛共和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事实上,鉴于战后初期德国经济与社会的状况,广泛的社会政策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唯一能够延续的是俾斯麦在1883年开始引入的法定(强制)社会保险,联邦德国成立前业已存在的社会保险网与德国社会保险的传统体系完全相符。

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在社会市场经济的旗帜下社会政策的传统领域在不断扩大,国家的社会干预主义趋势不断蔓延。1957年的养老金与工资增长挂钩的养老金改革是其中决定性的一步。但阿贝尔斯豪塞认为,养老金改革为德国做出的贡献功不可没。它帮助德国公民重新建立起了对西德社会国家的信任,进一步巩固了社会团结与和平。此外,改革并未带来负面的经济后果。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在社会民主党联邦经济和财政部长卡尔·席勒(Karl Schiller)的领导下,德国社会保险基金两位数的增长大大快于国民收入增长率,这成为在德国实行迟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政治决策者希冀借助福利国家达到熨平经济周期和为全体公民提供可持续保障的目标。但后来的发展表明,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社会保障金的无节制扩

^①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London: CPI Group Ltd., 2013, p.109.

大导致国家财政负担沉重而难以为继,国家高负债和高工资附加成本是经济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社会保险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但是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德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更有效率,而不是抛弃它,因为它从一建立起就是德国社会生产体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1967年通过的《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稳定法》)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被誉为德国“经济政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但是,由于德国的经济结构与制度设置,凯恩斯主义式的经济政策在德国注定受到很大的限制。首先,德国经济十分依赖于世界经济,国内依靠财政刺激扩大有效需求的宏观调控在世界经济剧变的形势下不能奏效。两次石油危机对德国外向性经济的打击就是最好的证明。其次,由于德国历史上两次遭遇恶性通货膨胀,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严格遵循不受政府干预的原则,这一制度设计使德国财政政策扩张性目标受到货币政策反向操作的约束。

与此相反,20世纪70年代席勒与施密特政府倡导的“联合行动”却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即在工资形成、投资、就业以及提供培训岗位等重大经济问题上协会与团体之间达成协商合作的范式,政府在其中扮演协调人的角色。同时,70年代中期,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开始实行的“雇员共同决策制”得以扩大,致使大企业内部雇主与雇员内部协商机制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一制度在德国得到了长期和稳定的发展,即使社民党不在联邦政府中占主导地位后也是如此。虽然由于条件的变化,“联合行动”已经无法延续其制度化的方式,但德国的“社团市场经济”模式还是在2007年金融危机中再一次展现了其优越性。因此,阿贝尔斯豪塞认为,在目前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后工业时代,德国应该发挥其社会生产体系的比较优势,利用历史沉淀的、密集的制度和网络,通过合作和协商达到不同团体的利益平衡。这种自我组织、自主管理需要各个利益团体,特别是企业家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准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为法国企业家阿尔伯所称道的、在欧洲逐渐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莱茵资本主义”(Rheinischer Kapitalismus)的特质。而在德国乃至核心欧洲所面临的诸如大规模失业等问题的根源不是“劳动成本过高”,而是由于福特式大规模批量生产退出历史舞台后劳动市场上的资质错配。目前结构转型的重点不仅是建立一个服务型社会,而且还要包括制造业的第三产业化,德国不能放弃其非物质价值创造为主的现代制造业,它是德国保持自身国际竞争力的坚实基础。

四 欧洲一体化中的政治优先

今天,经过50余年的发展,以共同体方式演进的欧洲一体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

度,以至于我们离开欧盟的机构、法令和政策就无法对成员国的经济与政治秩序与运行做出评价。因此,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也应是德国经济史的一部分。目前学界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动力问题还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由于欧洲一体化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关税同盟、欧洲统一市场和货币联盟),而在所谓的高政治领域一体化却步履维艰,在外交与防务政策方面政府间合作至今仍是主要的决策手段。因此,人们普遍接受了对欧洲一体化的功能主义解释:欧洲一体化主要在经济领域发生,超国家机构权能的扩大随着经济治理、特别是单一市场发展的需要不断前进。但阿贝尔斯豪塞不同意这种观点。根据对煤钢共同体建立前后历史的深入研究,他认为,当时法国倡议的动机既有经济上自我壮大、也有在防务问题上约束德国的考虑。而就德国而言,在20世纪50年代的特殊背景下,要恢复主权乃至欧洲大国的地位除自愿自我约束以外,没有其他的选择(一战前的“中欧”霸主以及“世界殖民大国”均已成为噩梦)。德国的未来在于西欧联盟,而重返(西部)欧洲则必须付出应有的政治代价(比如放弃核武)。不是欧洲观念、经济重振,而是政治决策是欧洲一体化的核心动力,这是一体化功能主义发展的前提。

从后来的发展来看,无论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还是欧洲货币联盟的启动,约束德国和德国自我约束的政治考虑都起了主导作用。从这一视角来看,关于欧元区是否达到“最佳货币区”标准的学术讨论失去了意义。悖论是欧洲联合在经济上对抗美国和日本的协调努力难以成功。欧洲产业政策虽然在民用航空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空中客车),但是在信息技术领域建立一个欧洲联合企业的努力却失败了,致使在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方面欧洲至今无法与美日竞争。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位于欧洲中心、人口最多以及经济最强大的德国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起到关键作用。由于欧盟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经济上分化严重,协调治理越来越困难。在目前欧洲债务与金融危机尚未根本缓解的情况下,欧盟的前途越来越扑朔迷离。特别是在经济上,欧盟对于德国的重要性相对10年前有所下降。但是只要德国在政治上仍然将欧洲联合作为其唯一选择,凭借其超强实力,仍然是欧洲一体化的“定海神针”。

综上所述,阿贝尔斯豪塞在这部著作中令人惊讶地将历史叙述、理论阐释以及现实评论成功结合,将德国经济模式和秩序政策的特征的描述与阐述放到历史情境中,使那些原则与概念具有了时间和空间感。阿贝尔斯豪塞强调德国历史的连续性,对德国经济史的断裂论据提出尖锐的质疑。但他对普遍流行观点的挑战还不止这一个方面。比如,他还用数据分析表明,尽管社会国家推行了“人民资本主义”(Volkskapital-

ismus)的举措,在被认为“均富”的德国,财产(特别是生产性财产)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趋势并没有消失。由于他的一些观点与我们熟知的有所不同,作为一名从事德国经济研究的学者,笔者在阅读这部著作时深为震撼。著作材料详实,但绝不琐碎。非常值得称道的是,阿贝尔斯豪塞并没有像通常的经济史著作那样使用大量的数据图表,长达700多页的作品仅使用了38张图表。

当然任何作品都不可能没有瑕疵。纵览全书,可以感到作者在对一些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上比较偏向于中左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比如,他对曾经担任联邦总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施密特的经济领导能力做出了超高评价,而对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联邦总理科尔的评价则较为负面。这似乎与科学工作者应该在其研究中保持价值中立的原则不相符合。因此,读者在阅读时应该注意将作者基于历史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与他一些不自觉流露出的政治偏好区别开来。

阿贝尔斯豪塞这部著作的主题是德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连续性以及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这对于中国目前的制度变革具有重大的启示。在我们对目前国内一些重要的经济制度(比如国有企业)做出评价以及对重大改革决策进行考量时,需要学会从历史的长期框架中去看待问题。因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在引导制度变革时不能忽视历史。根据德国改革的经验(比如对俾斯麦传统的养老保险体系的改革),在路径依赖的条件下,制度创新更容易实现,而且无论在现行框架内还是在现行框架外付出的成本更低。换言之,从长期来看,制度的存续必然与实质性的内部变革联系在一起,但形式上的连续性会使变革的实现更容易,获得更多利益相关者的支持。

德国战后的经济发展是一部很好的自力更生的教科书。我们可以从中学到最好地利用国内与国外两种资源的经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有利的国际环境,但是外因需要通过内因发挥作用。目前,中国国内经常有所谓新“马歇尔计划”的提法,将当前通过“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来帮助周边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举措与战后美国在欧洲实施的“欧洲复兴计划”相提并论。但事实上,根据阿贝尔斯豪塞对历史数据的详细挖掘,美国“马歇尔计划”对于德国经济重建在经济上的帮助有限。同样,如果一些丝路沿途国家不能依靠自身的努力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那么再好的外部条件也无法发挥积极的作用。

(作者简介:史世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教授;责任编辑:莫伟)